

DaxueDeZhuTiLiLiang

大学的主体力量

刘剑虹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的主体力量

刘剑虹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Z148800

大学的主体力量

刘剑虹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91 千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 - 5613 - 1937 - 1/G·1422

定 价:11.0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序

杨德广

大学是大师荟萃、名师云集的地方，没有大师和名师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或者说是水平不高、质量欠佳的大学。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凡是一流大学都拥有大批一流的教师。如麻省理工学院，在1700名教师中，有科学院院士74人，工程科学院院士93人，诺贝尔奖获得者8人；伯克利加州大学，在1500名教师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12人，普立策奖获得者6人，有科学院院士186人，工程科学院院士60人。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都有一批著名的一流水平的教师。

当然，不可能每所大学都有如此众多的大师、名师，这里无非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发展教育，关键在教师。教师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从事着极其光荣而又崇高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写道：“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又是人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宝贵遗产的继承者、传播者、发展者和新知识的创造者。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全面素质和教学科研能力，是高等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和经常性工作。一要提高教师的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按职称高低，贡献大小，制订合理的教师住房标准，合理的报酬，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二要加强教师的培养和知识更新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的迅猛崛起，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大学教

师必须加强培训和进修(包括道德教育、理论修养),通过反复培训和进修,参加科研,不断吸取新知识,更新知识结构,从而提高自身的素质。为了适应新学科、新专业、新课程的需要,为了及时掌握并传授当代最新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三应建立一支兼职教师队伍,或从教师编制中划 15% 的名额作为流动编制,聘请校外一流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四要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大学教师的主要来源应依靠引进国内和国外高层次人才,制订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公开招聘人才,到国外高校和国内人才交流市场去招聘人才。五是重用和信任教师,要多让他们挑重担,为他们创造一个和谐、宽松,能充分施展才能的环境。六要制订合理的工作量和考核制度。要改变平均统一的分配制度,提高教师工作量的含金量,应根据教师担任的教学、科研、社会工作的状况,贡献大小,区别对待。每学期和每学年考核一次,其结果与分配、奖励、等级等挂钩,以形成良性的激励机制。

总之,我们要给大学教师以充沛的精力,充足的时间,充分的自由和充裕的条件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使他们在大学的舞台上,有英雄用武之地,大显才华之地,大展宏图之地。

刘剑虹同志的《大学的主体力量》,是专门研究大学教师的一部专著。作者专门从事高师培训和人事工作,有丰富的高校管理实践经验,并在业余时间勤奋学习,悉心研究,挤出时间撰写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文章。从这本论文集中可以看出,作者善于从工作中找问题,找课题,并从理论上加以提炼、提高,进而再指导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文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鲜明,有很强的理论性、针对性和现实性。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干部、教师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对研究人员一定会有很多的启迪,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教师的研究工作,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8年8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杨德广(1)

第一编 教授:大学的灵魂

- 一、大学教授:文化评价及其意义..... (2)
- 二、论大学教授的教学..... (12)
- 三、论大学教授与学术活动..... (24)
- 四、关于跨世纪高校学科带头人培养的几点思考..... (33)

第二编 青年:师资建设的重点

- 五、论跨世纪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思路与观念..... (44)
- 六、当今高校青年教师正常成长状态及其导向措施..... (58)
- 七、高校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系统化方向..... (68)
- 八、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提高途径的初步阐释..... (81)
- 九、高校青年教师不稳态的社会生态学思考..... (90)
- 十、因地制宜,做好稳定教师队伍的工作.....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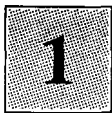
第三编 培训:教师发展的动力

- 十一、试论高校师资培训规律及其与效益间的关系 (112)
- 十二、我国教师培训工作的文化特征及其转型 (122)
- 十三、我国高校师资培训工作深化的趋势 (134)
- 十四、高校青年教师培训途径的最优化 (142)
- 十五、高师师资培训“递进模式”简论 (150)
- 十六、进修学者——导师制的一种延伸与拓展 (158)
- 十七、教师与培训:演变过程的考察、比较与协调策略 (164)
- 十八、当前高校师资培训工作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180)
- 十九、关于建立高校师资培训考核制度和体系的认识和构想
..... (187)
- 二十、关于省级高校师训中心建设与发展的几个问题 (196)
- 二十一、关于省级高校师训中心建设与发展问题的再思考
..... (202)
- 二十二、省级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职能整体强化的实践与认识
..... (208)

附录:

- 增强应变能力,使师资培训工作出现新转机 (215)
- 分层次培训:“七五”培训工作的有益探索 (219)
- 从实际出发,狠抓高师师资队伍建设 (224)
- 后记 (235)

第一编 教授：大学的灵魂



大学教授：文化评价及其意义

教授(Professor),《辞海》释义为“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之一”,更确切的解释应是“高等学校教师的最高职务名称”。其原义简单而又明了,但人们对“教授”一词的理解并非如此单一,而是赋予它多种具有象征性的含义,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这种文化符号蕴含着的是社会对“教授”的价值评判和角色期待,无疑它属于文化评价的范畴。当今,大学教授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种文化的挑战与冲击,其角色、形象变得有点模糊不清。因而,对“教授”名称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探讨,会有助于人们(包括大学教授本身)正本清源,清楚地认识大学教授的历史责任和生命价值,从而为高校教师管理改革提供一种内在逻辑。

一、大学教授：一种文化符号

德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①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页。

语言是最为典型的文化符号。任何文化符号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并且具有一定的结构与逻辑,正如巴特所说的“符号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和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物。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方面,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则组成了内容方面”^①。“能指”具有形态性,“所指”具有表意性。后者是文化学所着力研究的内容。“所指”的表意性是指符号能包含的意义。“符号的含义源于并取决于使用符号的生物有机体;人类机体赋予物体或事件的意义,从而使它们成为符号。用约翰·洛克的话来说:‘符号的意义是人们任意给定的’”^②。根据这一理论,“大学教授”作为一个职务名称,无疑具有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大学教授”是一个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而这些象征意义基本上塑就了大学教授的文化形象,规定了大学教授的本性、天职和生命价值。

大学教授是高层次的教育者,从事着具有高社会价值的教育活动,其影响度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乃至角落,因而有着很高的职业声望。据1997年12月22日《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一项职业声望调查表明,在能反映中国职业结构的100种职业的职业声望排序中,大学教授高居第二位(科学家、工程师、物理学家、医生分列第一、三、四、五位)。又据《参考消息》报道,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所根据1997年3月26日至4月1日对1006名成人的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教师(主要是大学教授)位居职业魅力排行榜第三位(医生、科学家分列第一、二位)。由此可见,大学教授拥有很高的社会认同度和职业声望,因而出现攀附大学教授之风尚,如报刊上常见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实验师”之称谓,

^① [法]R·巴特著,董学文、王葵译:《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5页。

^② [美]怀特著,曹锦涛等译:《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4页。

甚至出现有些地方评选“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教授级技术工人”的活动。社会各界对大学教授的评价虽然不尽相同,但对其的推崇、敬重几乎完全一致。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化评价。这种评价内含着一定的逻辑结构,即从表层到深层,按逻辑逐层逐级组合成一个象征意义体。这个象征体是顺着下列三个问题而展开的:

大学教授是什么?

大学教授有什么本质特征?

大学教授以什么样的生命方式存在?

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组成了“大学教授”的文化意义结构,并呈现明显的“表层→中层→深层(内层)”的递进形态。具体述之:

(一)大学教授是什么——“讲课的学问家”

我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清末的“戊戌变法”时期。从那时起至40年代末,大学教授(初时称为正教员、正教习)的文化形象随着近代大学的发展与成熟而逐渐定型,并且成为民众的基本看法。王国维在《教育小言十三则》中提出教员应谓之“职业的学问家”^①,并认为“高等教育之责任,在使英雄与天才得其陶冶之地,而无夭阏之虞”,^②因而,它“为国家名誉最高、学问最深之大学教授”。^③王国维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晚清对大学教员的社会评价。民国初年,大学教师的职务名称得以统一,“教授”居首。蔡元培长北大时,提出改造旧北大“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④“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⑤1931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

① ② ③ 徐洪兴编选:《求善·求美·求真——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47、121、123页。

④ ⑤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627页。

造就人材，”并强调“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①。这里的“大师”即指在学术上有国际影响的学问家。从上述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可知，在近代，我国大学教授的文化形象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沉淀而基本定型。正如著名学者张岂之在回忆北大文学院读书情景时所说的“在我们的心中，教授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他们首先是讲课的学问家，能开出多种深度的课程”^②。无疑，大学教授的首要职责是教学，其二是科研，而且大学教授的教学与科研必须是高水平的，且可冠之于“家”的，即教育家、学问家（或称“科学家”）。当然，大学教授就其教学、学术水平而言，是有层次性的。这种层次性，给大学教授提供了一种不断进取的内在动力。从承担教学任务分，有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本科教授、专科教授；从学术声望分，有诺贝尔奖教授、大师级教授（即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院士教授、学者教授等，如史学大师陈寅恪，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从承担科研任务及作用分，有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等。无论处于哪一层次的教授，都应该是“讲课的学问家”，而且必须从合格教授努力向知名教授、著名教授努力。只有这样，才无愧于“大学教授”之称号。

（二）大学教授有什么本质特征——“有高尚道德、有很高修养的人”

中国大学教授最早的原型是“士”。“士”始于春秋战国的孔子时代。孔子曰“士志于道”，且进而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把“君子”作为“士”的主体形象，并给“士”贯注一种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精神，要求每个“士”者都能超越自己个性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和对道德至上的毕生追求。此后，各朝代对教师的要求大多承继孔子的观点。

^① 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0页。

^② 张岂之：《北大的灰楼》，《教学与教材研究》1997年第2期。

南宋朱熹明确提出：“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到了近代，有了“经师”与“人师”之论，倡导“人师”与“经师”合一已成为社会的普遍期望。大学教授已作为一种价值模范而受到人们的崇高敬意，因而“有高尚道德、有很高修养的人”成为大学教授的本质特征。那么，大学教授最鲜明的道德规范是什么呢？孔子曰：“仁者，爱人。”无疑，“仁爱”是中国大学教授的道德规范的集中概括。细言之，一是热爱学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二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是为人师表，学术至上；四是以善先人，安贫乐道。

孔子所说的“君子儒”，除“德”之完善之外，还包含着教养、修养等方面的要求。孔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指的是富有教养、修养。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往与个人行为方面，是“士”内在素质的外化，而其基础是“士”自身所拥有的文化知识修养。这种“君子”风度，至今仍被大众文化所推崇。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由于教师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所以教师职业风度美的主要特征是文雅和书卷气。从这一特征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教师和其他职业的人区别开来。教师的文雅和书卷气，主要表现在谦和、含蓄、真诚、彬彬有礼、端庄大方”^①。无疑，处于教师队伍最高层次的大学教授更应具有“君子”风度之美。

“有道德”，“有修养”，这是由中华民族文化所弘扬和框定的，它已成为中国大学教授乃至整个教师群体的最鲜明的本质的文化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将会永远被中华民族教师文化所吸纳。

（三）大学教授以什么样的生命方式存在——“精神富有的人”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句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士”的生存方式：精神富于物质。这也是中国大学教授的最典型的生命形态。生存不仅仅有一种现实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一种超越的意义。高质量的生存过程，就是智慧地理解和适应世

^① 赵立伯主编：《教师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10页。

界而“诗意地活着”(海德格尔语)的形式。无疑,大学教授的生命方式是高层次的,因而生存质量是高的。因为他所从事职业具有很高的学术性与精神性,并且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水平乃至命运相联系。大学教授的生活是一部由“读书——教书——写书(即研究)”组成的“交响乐”。然而,这种学术职业注定只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安贫乐道”。韦伯说过:“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科学探索者都把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本身视作至高无上的幸福,确认这过程本身就是伟大的,即使失败,但生命的意义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① 中国学者更直率地说:“大学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生活却是清苦的,因此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发财,就不要留在大学;要想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也不要留在大学。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大学教授也不会比商人、企业主或体育、文艺明星更有钱,也没有一位名教授比一位政治家甚至流行歌星更有知名度。”^② 不可否认,大学教授是“精神上的富有者”,其“生命的印证,个人的经历,都与他们的学术生命融合在一起”,为教学、为学术而演绎人生。当然,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并非一模一样,而是因时因地呈现不同之形态。以近现代为例,我国大学教授的精神类型粗略可分为下列几种:

1. 理想主义

著名哲学家贺麟抗战中在西南联大执教时撰文说:“理想是构成人格的要素,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伟人所以异于常人,全凭理想的有无和高下。”^③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大学教授,自晚清诞生以来,就高举着理想主义的大旗。我国近代大学是在救亡图存、西学东渐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而伴随

^① [德]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9月版,第200页。

^② 陈家宽:《大学青年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高等教育研究》(华中理工大学)1993年第3期。

^③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6年1月版,第103页。

近代大学产生而出现的中国大学教授一开始就显示强烈的“救国”抱负,并以此作为生命价值之本。这样,“救国”就成了中国大学教授的理想主义的标杆。当然,“救国”之路选择有异,大致可分为两类:(1)“教育救国”、“学术救国”。这是占主流的教授之理想。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梅贻琦、陈寅恪、蒋梦麟、竺可桢等为“教育救国”理想主义者的代表。这类理想主义者坚持“教育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拥抱民主与科学,在高等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矢志不移,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朽的业绩。(2)“政治救国”。陈独秀、李大钊、罗家伦、胡秋原等为其典型代表。这类理想主义者深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至于政治倾向大相径庭,一是信奉共产主义,一是崇尚三民主义。30年代之后,后者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走向右翼甚至反动。其实,“教育救国”、“学术救国”、“政治救国”的理想时而整合,时而分道。如梁启超就是从“政治救国”走向“学术救国”的。在近代,理想主义精神确实成为中国大学教授的文化生命的本质标志,并且激励着广大教授为国兴学育才,推动民族学术独立进程,其功不可灭。

2. “现实主义”

这里,“现实主义”指的是以现实利益为惟一价值取向的精神类型。“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崇高现实,追求功利,以自我为中心。这类教授大多是把教书只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缺乏远大理想,只图眼前利益,一心想走“仕道”“商道”。钱钟书的《围城》中所塑造的“三闾大学”教授方鸿渐,可谓“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现实主义”在中国历来有存在之土壤。它的极端形态是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到本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在我国大学中非常盛行,甚至大有泛滥之势。

3. 自由主义

这是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大学教授的精神类型。其典型代表有严复、胡适、周作人、罗隆基、梁实秋、张东荪等。自由主义者信

仰独立精神、自由精神,提倡个体本位,其教育理念为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及“思想自由”。自由主义在“五四”前后十分活跃,影响很大,30年代以后渐渐走向低潮,陷入孤寂,只有胡适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成为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自由主义便没有了市场,但不等于这种精神的绝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精神似乎又重返大学校园,在一部分大学教授主要是青年教授中悄然流行。

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三种精神类型,基本上构成了我国近现代大学教授的精神图谱。从中可知,我国大学教授中虽然不乏“现实主义”者,但多数人都把精神追求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可谓是“精神贵族”。因此,“精神富有的人”是大学教授的生命写照,构成“教授”的文化象征的深层内涵。

二、文化冲突:大学教授的现实困惑与艰难选择

当大学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国大学教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陷入了现实压力与内在理想的深度困惑与艰难选择之中。人们一旦走进大学校园,也许会感觉到大学不再幽静,不再孤傲,代之而来的是破墙开店、商气袭人。生活于其中,并以学术为业的大学教授面临着的是极为严峻的文化冲突与选择:是执迷于学术,还是迎合世俗?是继续其“书斋学问”,还是到经济战场去搏击?是高扬理想,还是面向现实?是清贫育才,还是经商致富?……总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孕育与发展,大学教授的角色冲突愈演愈烈,以致“教授”这一名称的文化象征意义开始部分丧失。“讲课的学问家”,“有高尚道德、有很高修养的人”,“精神富有的人”三重奏似乎不再嘹亮。人们不禁要问:大学怎么啦?大学教授怎么啦?然而,人们细细分析,又觉得大学依然是大学,教授依然是教授,只是多了几种色彩,少了一些文化气息和学术因子。

80年代开始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公开发表以来,我国经济基业显露勃勃生机,“市场”“商品”成了文化

的中心词,一时间,经商之风盛行,“下海”之声四起,人人都想争作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这是历史提供给每一个人的机遇和选择。大学教授在这一历史机遇面前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艰难的选择:

1. 执着于教书生涯

大学教授队伍中多种人仍固守杏坛,呵护科学地盘,潜心于教学与科研。当然,大学教授们面对着拜金主义的泛滥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落,面对着“教育兴国”的理想与价值的摇摆,深深感到有几分无奈与叹气。

2. 做市场“弄潮儿”

这些教授(以中青年为主)采取辞职、停薪留职及调动等方式,“英雄般”走向“商海”,成为“下海潮”的领头人。事实上,“下海”教授除少数人颇有业绩外,多数人尝到的是市场竞争的苦涩与无情。1994年前后,有些人重新回到大学,重操旧业。

3. “兼职”赚钱

有些大学教授不愿离开自己熟悉而又有“铁饭碗”的大学,而采取“兼职”方式,努力使本职与兼职相结合,使教书与赚钱相统一。事实上,这类教授由于“兼职”情况的千差万别,因而难以作一致的评价。有的以兼课为主,或以科技开发为主,这类教授的“兼职”对本职工作影响较少,有时反而有促进作用。那些以赚钱为目的,又与教学科研工作相距过远的兼职活动,大多对本职工作影响很大,容易丧失了大学教师的天职和师道。

4. “入仕做官”

少部分大学教授由于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80年代中期开始纷纷走上仕途,当省长、市长、县长或当大小书记等。

上述四种选择,其实是不同文化的选择,对高校教师队伍尤其教授群体产生了不少的震荡,可谓是一场文化冲突。这说明大学教师文化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向。这种文化多元化,或多或少开始影响或改变着社会对大学教授的评价。那么,“大学教授”的文化